

文人宰相  
大平正芳

〔日〕新井俊三 森田一 合著  
祖秉和 曹允迪 合译

文人宰相

大平正芳

新祖〔日〕新井俊三  
华秉和 森田一  
出曹允迪  
版

著者

文人宰相大平正芳

新井俊三 合著

森田一 合著

田中弘吉 发行

春秋社 出版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第一版

根据日本春秋社1982年出版的《文人宰相大平正芳》一书译出。

文人宰相大平正芳

〔日〕新井俊三 森田一 合著

祖秉和 曹允迪 合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1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插页2张 147,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统一书号：3203·083 定价：1.35元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邓小平副总理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  
首相大平正芳及其随行人员。

## 译者的话

大平正芳曾历任日本多届内阁的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通产大臣、大藏大臣等职，1978年12月27日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至1980年6月12日逝世。

本书作者新井俊三是大平正芳的智囊。长期以来一直给大平写“新井报告”，提供经济及国际形势方面的情况。大平很重视“新井报告”。森田一曾任大平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现任众议院议员，他又是大平的爱婿，为本书提供了不少外人不知的事实。

本书内容涉及到大平正芳在政治、经济、哲学以及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思想、态度，可说是一部介绍大平正芳的很好著作。

大平正芳是一位具有创见和远见的政治家。他是“政治作用有限度”论者，同时又是现状肯定论者。他认为现状是历史成果的积累，同时又蕴含着对未来的展望。他所主张的“永恒的现在”，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对现状的肯定。

在内政方面，大平主张维持通货价值，反对通货膨胀。认

为通货膨胀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最大原因；但他又反对人为的控制物价。他是所谓“小政府”和“振兴民间活力”的信奉者，主张尽量发挥地方及各阶层国民的积极性。在财政金融方面，他主张中央银行要有独立性，尽量避免政治干预。认为政治干预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他锐意改革，把重建财政视为自己的使命。

在外交方面，他坚持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视日美外交为日本外交的基本。在恢复中日两国邦交问题上，大平的态度非常积极，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中，大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出版该书，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本书译文对原著的个别地方作了少许删节；书中的注释全部是译者加的。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书中有些观点不一定和我们相同，个别的甚至完全不同。这些，读者是会加以鉴别的。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者一九八五年四月

## 前　　言

日本的宰相在当政时往往得不到好评，这似乎形成了日本的一个特点。

大平先生在生前也没有获得好评，有时甚至还受到宣传界及一些政治家的严厉责难。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也许是因为他死得特别突然，所以社会上对他的评价骤然为之一变。

思前想后，我觉得大平先生是一位应当在历史的展望中进行评价的人物。从“历史的展望”或者说从历史的洞察观点出发，理解大平先生的言行就非常容易。

大平先生的人生观——“永恒的现在”，就正是历史的展望思想。

据说，“政客所考虑的是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所考虑的则是下一个时代”。大平先生生前所经常思考的是“超越现代”的问题，他的思想早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

另外，他还被人们称为“哲学的大平”。所谓哲学的，往往系指他那探讨事物之本质、寻求知识之真谛的态度。修昔

底德<sup>①</sup>曾经指出：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第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能够在各种情况之下，“知道应该干什么”，即要富有智慧和洞察力。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大平先生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有洞察力的领导人”。

如若仅仅称大平先生为“哲人大平”，也许有点儿过分严肃。大平先生是一位诚实、和蔼的人。与此同时，他身上还带有一种庶民气息。因此，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哲人，不如称他为文人宰相。

大平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求索的一生。这样说也许大平先生会说是对他的美化而不予同意。但是，回顾一下大平先生的生平，就会发现他那真挚的人生历程和致力于寻求日本、或者说日本民族前进道路的精神。

或许由于我是一桥大学的后辈，所以大平先生宽容地把我招至他的身边，特别是在他晚年的几年间，使我得以直接接触到大平先生的人品及思想。尤其在大平先生当政的一年零几月的时间里，使我有幸竭尽全力辅佐他治理国事。

大平先生担任总理的一年半的时间虽说是短暂的，但是我觉得那却是他毕生呕心沥血的最终结果。

在这本书里，我记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大平先生担任总理大臣的五百五十四天的历程，并且尽可能努力做到客观地反映一切。如果能够表现出大平先生求索的精神，则是笔者之所幸。

---

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

众所周知，与我合著此书的森田一先生是大平先生的爱婿。二十年来，无论是处理公务，还是日常生活，他都与大平先生朝夕相处。所以，许多世人所不知道的事实，都是由他直接谈出来的。也许由于他是大平先生的至亲而不便于亲自来写，因而就由我代笔了。

最后，本书是在原来《经济学家》杂志上连载过的《政策智囊的回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在此，谨向该杂志的总编后藤基先生和担任记者的图师三郎先生致以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向在出版过程中，特别予以大力协助的春秋社的水吉俊彦先生，以及帮助做校对和其它工作的川崎康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新井俊三  
一九八二年元旦

# 目 录

## 前 言

<b>第一章 我与大平先生的相识</b> .....	1
一 大平先生任藏相时期我就给他写报告 .....	1
二 大平与福田之间的角逐 .....	16
三 深夜完成报告 .....	19
<b>第二章 通向首相之路</b> .....	28
一 田中内阁诞生前后 .....	28
二 田中辞职与椎名裁定 .....	35
<b>第三章 东京首脑会议的考验</b> .....	44
一 组阁以后遇到的问题 .....	44
二 非凡的外交感觉 .....	52
三 日美间磐石般关系的形成 .....	58
四 受石油问题左右的东京首脑会议 .....	67
<b>第四章 毅然参加众议院竞选</b> .....	75
一 东京首脑会议结束 .....	75
二 重建财政的坚定信念 .....	89

<b>第五章 四十日抗争</b>	99
一 四十日抗争的决定性瞬间	99
二 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	104
<b>第六章 历史性的公定利率的提高</b>	109
一 首相和日银总裁的情谊	109
二 大平先生的通货思想	112
三 居安思危	122
四 宰相的决断	126
五 病床上的政策回顾	136
<b>第七章 未及正式开展的东北亚外交</b>	139
一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139
二 大平先生的中国观	150
三 日韩关系的改善未能尽如人意(略)	155
四 田中、大平访苏与领土问题	155
五 苏联入侵阿富汗与对苏外交	162
<b>第八章 大平总理的本来面目</b>	171
大平先生身边琐记	171
<b>第九章 永恒的现在</b>	192
一 不惜流汗的政治	192
二 感受性丰富的青春时代	202
三 一桥的学风和大平哲学的来源	210
<b>后 记</b>	233

# 第一章 我与大平先生的相识

## 一 大平先生任藏相时期

我就给他写报告

### (1) “新井报告”的开端

大平先生是我在一桥商科大学时代高一届的校友、年龄比我大四岁的兄长。我最初与他相识，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担任三菱瓦斯化学常务董事的相川泰吉先生（现任董事长，在一桥商科大学时与大平先生是同届），在我还在担任三菱信托银行的常务董事期间，有一次曾对我说：“一起去和大平先生打高尔夫球好吗？”于是，我们三人就到湘南的高尔夫球场一起打了一次高尔夫球。这是我与大平先生的第一次接触。我记得他当时是自民党的政调会长。

是在我们打完了高尔夫球之后去洗澡闲谈时，还是在打球的时候，具体我已想不清了；但记得他曾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新井君，资金、地盘都具备了，你打算进不进参议院？”而我却冷漠地回答说：“不行啊，我这个人不适宜搞政治。”他又说了句：“你厌恶政治？”尔后，脸上露出了一丝苦

笑。如果说这是玩笑的话，似乎也带有玩笑的味道，但我觉得也带有一半认真的成分。因而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我当时的回答太不客气了。

我与大平先生真正开始密切的接触，是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我辞去三菱信托银行常务董事之职而创办新井经营顾问事务所之后不久，即在一九七〇年左右，大平先生担任通产大臣的时候。

当时，围绕在大平先生周围工作的一些经济界人士，他们有一个组织团体叫作“芳明会”。担任“芳明会”干事的是我的朋友宫崎良一先生。宫崎先生那时还担任三井轻金属加工公司的副经理。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最近芳明会打算吸收几位新成员，您愿不愿意参加？”这次作为新成员加入的有：宫崎先生已确定的三井铝制品公司的经理川口勋先生、日本矿业公司的现任董事长庭野正之助先生（这两位是大平先生的同届同学），以及三井不动产公司的经理坪井东先生。此外，还有我推荐的鹿岛建设公司的副经理原明太郎先生、兴和不动产公司的副经理高桥表美先生及日清制粉公司的常务董事铃木要七先生。“芳明会”每二至三个月举行一次聚餐会，会上大家边吃边谈。而大平先生是每会必到。

在一次聚餐会上闲谈的时候，大平先生对我说：“有空请常到我那里去玩！”这大概是在大平先生由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改任大藏大臣的时候，因而我说：“有一些经济界的新形势可随时给您汇报吗？”他回答说：“好，一定拜托！”从此，我就经常到大平藏相那里去了。

由于大平先生担任大藏大臣之职，因而整天非常繁忙，我去时居多见不到大平先生本人，而只是和他的秘书官森田一先生谈谈就告辞回来了。森田一先生每次见到我都问：“新井先生，有什么新的动向？”而我也每每回答说：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于是，森田先生就把我说的话记在笔记本上，以便事后向大平先生汇报。但是，因为森田先生平时也很忙，所以我就建议说：“以后我直接给大平先生写书面报告吧！”从此之后，我就开始给大平先生写“新井报告”。

## (2) 报告内容扩大至国际形势

我第一次给大平先生写这种报告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这次报告被用朱笔加了许多批注之后又退还给了我，说是为了供我参考。因为森田先生也是一位举止慎重的人，所以估计报告上的批注是他就我在报告中所谈的意见可否让大藏大臣采纳，而让大臣办公厅的人们在传阅时所加的。

大臣办公厅的人们在我的报告上都加了些什么批注呢？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个例子。在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报告上有一个批注是这样写的：

“在《一九七五年度的政府经济展望》一节中谈到，(政府)估计国内的经济将逐渐恢复；另一方面，就物价来说，由于各种物价政策的实施，也将显现出相当稳定的趋势。对此，笔者(新井先生)注意到了现在产业界及金融界形势中的悲观部分，他对于景气现象在控制总需要的情况下能否自行恢复持怀疑态度；同时，在物价问题上他认为，即便暂时出现景

气现象，但由于成本的转嫁，以及人们对于通货膨胀恐惧心理的再度出现，前途也将不堪预测。总的来说，文中有许多意见值得听取。但在经济现象中，笔者把与自己认识相一致的东西都(有意识地)罗列了出来，这点也应该加以注意。”

无论怎么说，大藏大臣这个职务在内阁成员当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因而，大臣办公厅的人们应尽可能从多方面考虑经济形势，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就在我的报告上加了上述的一段批注。但在此后不久，他们就不再在我的报告上加朱笔的批注了。这样一来，我才感到批注对我写报告的帮助是很大的。坦率地说，我打心眼里很想知道下次又有一些什么批注。

不管怎样，在大平先生任大藏大臣期间，我几乎是每月给他写一次报告，从未间断过。报告的内容开始只谈经济形势，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不久即进一步涉及到了国际形势。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即自民党举行总裁预选的前一年，森田先生曾对我说：“如果(大平先生)取得了政权，就必须马上实施各种政策，因而我们现在就需要研究将来准备实行怎样的政策。”所以，从此以后，为了广泛地听取许多志同道合者的意见，我就更加积极地注意把一些学者、评论家，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实践性意见，归纳整理到我的报告之中。

### (3) 转达在野人士的原始意见

这里，我想给大家追述一段往事：那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轻井泽的别墅——原是已故佐藤荣作前首相的别

墅，后来，大平先生从其遗孀佐藤宽子那里借用——去拜访大平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森田夫人，即大平先生的令爱大平芳子女士亲手烹调的款待。当时，因为只有我和大平先生两个人，所以彼此谈得相当多。当谈到还需要政策智囊的时候，我说：“我可以让我那些关系比较亲密，而且很有能力的学者朋友直接与您合作。”大平先生在略加思索之后说：“若与特定的学者特别接近，就会相互有所影响，这样反而不太好。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请您把他们的意见加以适当筛选，然后再报告给我为好。”因此，从那以后，我就去听取我那些关系亲密的学者朋友们的意见，然后整理归纳为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大平先生。

因此，我的报告与其说是我本人的思想，还不如说是我归纳了作为我的思想背景的许多人的想法，而且报告的形式也为此而尽可能地做到转达他们的原始意见。

比如，我的经济研究所清晨在饭店里召开研究会议。会议一般分为若干小组举行，有以一桥商科大学时代的同窗为中心的小组会、以三菱系统各大企业的经营者为中心的小组会，以及研究特定议题的小组会(如防卫问题)等。但是，无论那种类型的会，出席人员都是与我的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因而，会上真正是甲论乙驳、各有千秋，并且由于他们都是经理、常务董事等身居要职的人物，所以没有比这些人的直率讨论更有意思的了。

大平先生在担任总理之前也喜欢参加我们这样的研究会议，并作为一名普通论客，即其中的一员，自由地参加讨论。